“妻管严”的婚姻生活幸福吗？

——基于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的分析

朱　斌　乔天宇

摘要：基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本文讨论了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地位对其婚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一般来说，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劣势地位（妻管严）会降低男性的婚姻满意度。但是这种消极影响随着具体情境而发生变化：一方面，对受现代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和个人而言，这种消极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妻子的男性基于爱与需要的原因将部分家庭权力让渡给妻子，这也没有导致他们婚姻满意度的明显下降。

关键词：婚姻满意度　家庭权力关系　现代化　资源依赖

一、研究问题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及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受到巨大冲击，现代家庭结构的稳定性遭遇了严峻挑战，离婚率逐年升高。在此背景下，关于婚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家庭社会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叶文振、徐安琪，2000；Bradbury et al.，2000）。因为婚姻满意度不仅对婚姻稳定性有重要影响（Waite et al.，2009；徐安琪，2012a），同时还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身体与心理健康（Fincham & Beach，2010）。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婚姻满意度，以及它们是怎样发挥影响的，是很多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家庭权力关系模式即为讨论的诸多因素之一。但如何测量夫妻间的相对权力大小一直存有争议，一些研究倾向于以家庭决策的结果来考察家庭权力（Katz et al.，1985；Mirowsky，1985）；但柴尔德（Safilios-Rothschild）则强调从动态过程来考察家庭权力，这包括权力基础（夫妻各自所占有的资源）、权力实施过程（双方在商议事情、解决问题和处理冲突方面的互动过程）和权力结果（最终由谁决策）（Safilios-Rothschild，1970）。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上述家庭权力中的事务决策和家务分工方面则更为研究者所关注（徐安琪、刘汶蓉，2003；郑丹丹、杨善华，2003；徐安琪，2005）。

许多既有研究都认为，在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在西方社会，夫妻在家中的权力相当时，女性的婚姻满意度最高，如果家庭权力出现了不平衡，无论夫妻哪一方占据了相对优势，都会降低女性的婚姻满意度（Michel，1967；Safilios-Rothschild，1967；Kolb & Murray，1974）。在中国社会，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早期研究认为，丈夫承担更多的家务和女性具有更多的决策权，婚姻满意度会更高（卢淑华，1992）。但随后的一些研究并未发现家务分工与家庭决策权同婚姻满意度之间有太大关系（徐安琪、叶文振，1998；陈婷婷，201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没有依性别进行群体区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父权家长制”传统的社会，家庭中以夫权为主导，对性别角色的分工是将男性视为“一家之主”（左际平，2002），因此女性做家务和男性掌握决策权是一种最为平常的权力关系模式，而这种权力关系模式的颠覆所带来的影响对于不同性别而言可能是相反的，即家庭权力关系平等化可能会提高女性婚姻满意度，但降低男性婚姻满意度，故而从总体上看则没有什么变化。已有研究显示，拥有家庭实权确实会提高女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徐安琪，2004）；但如果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即中国俗语中的“妻管严”，这是否会降低他们的婚姻满意度，目前还没有经验研究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夫妻间的人际关系包括权力关系对于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必须

置于特定的情境下考察,因为在不同情境下,这些影响可能不一样,而这些情景包括了宏观社会情境,如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等;以及微观的家庭背景,如夫妻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否有孩子等(Bradbury et al. ,2000)。就本文而言,这意味着"妻管严"的权力关系模式对于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是会改变,因此对于这些情境因素的讨论是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回顾以往有关家庭权力关系和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一方面,也许和历史上女性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有关,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女性群体,而少见专门针对男性群体的分析,但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婚姻满意度也不能忽视,毕竟男性更可能在不满意的情况下使用家庭暴力,而且所造的肢体伤害更大(王天夫,2006)。另一方面,国内各类研究很少讨论调节家庭权力关系对婚姻满意度影响的情境因素,而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尽量减少家庭权力关系对婚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本文试图在这两点上做一些突破。

二、研究假设

(一)"妻管严"与男性婚姻满意度

"妻管严"可以理解为一种妻权主导型的家庭权力关系模式,它描述的是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妻子占据着相对优势的位置,而丈夫在大多数的家庭事务上需要听从妻子的安排(许放明,2014)。但是,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男权制社会,"夫主妻从"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权力关系模式,而"妻管严"则有悖于传统社会规范对夫妻角色关系的期待,故而常常受到人们的嘲讽。另一方面,男性群体的性别角色观念更偏保守和传统,并且在不同年龄群体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刘爱玉、佟新,2014),对于更为保守的男性群体来说,若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则与他们所持有的性别角色观念相冲突,从而会削弱他们的婚姻满意度(申顺芬、林明鲜,2013)。综上,由于"妻管严"角色与传统社会规范以及男性自身的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相悖,因此会降低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相对于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来说,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占据劣势地位的男性,其婚姻满意度会更低。

(二)宏观情境:现代化变迁下的"妻管严"

现代化理论认为,为了满足经济—技术理性发展的功能需要,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都会随着现代化进程而改变,其中也包括家庭结构和性别观念。一方面,人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逐渐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而现代性别观念强调的是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的性别分工;另一方面,大多数女性都走出家门,参加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从而摆脱对男性的经济依赖。因此,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会趋于平等化,越来越多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模式从"夫主妻从"转变为"夫妻平权",甚至是"夫从妻主"(马春华等,2011)。如果现代化逻辑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妻管严"角色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其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就会变小,甚至可能不再发挥影响。

本文主要从两个角度考虑现代化进程的影响:首先,就社会层面来看,现代化发展越高的地区,社会对"妻管严"的接受程度越高,这里用城乡来衡量地区现代化的发展程度,认为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要高于农村;其次,就个人而言,受现代化影响越深的男性,其个人的性别角色观念越现代,越能接受"妻管严"角色,这里使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男性受现代化影响的程度,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男性,我们认为其受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越深。由此可以得到两个假设:

假设2.1:在农村,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会削弱其婚姻满意度;但在城市,这种消极影响更小,甚至不会有影响。

假设2.2: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会削弱其婚姻满意度;但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而言,这种消极影响更小,甚至不会有影响。

(三)微观情境:社会互动过程中的"妻管严"

现代化发展只是"妻管严"权力关系模式形成的宏观社会背景,但从微观上看,夫妻权力关系形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社会交换理论认为,夫妻双方的互动事实上是一个资源交换过程,当一方在某种资源上依赖于对方却不能给予对方适当的回报时,就会以依从作为回报,那么另一方就获得了权力(贾春增,2008:251-252)。当然,这里的资源是从广义上的,包括了物质资源和感情资源,从这里也可以区分出"妻管严"形成的两种具体路径,而在不同路径下,"妻管严"角色对于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

首先,资源理论强调家庭权力大小来源于夫妻物质资源的相对差异,认为夫妻中在物质资源上(如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的社会地位等)占据了相对优势的一方,在家庭决策中也往往具有更大权力(Szinovacz,1978;McDonald,1980)。左际平(2002)认为,在缺乏与丈夫"谈判"的经济基础情况下,妻子会通过多做家务来取得"女性资源",用以换取丈夫的"男性资源"——与丈夫分享其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从这一角度来看,"妻管严"的形成通常是因为丈夫在家庭外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不如妻子,为了分享妻子的社会资源,就会在家庭内让渡一些权力给妻子。

其次,"爱与需要相对理论"对于资源理论将资源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源提出了强烈批评。该理论认为,夫妻之中爱对方和需要对方的程度才是解释权力关系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夫妻中爱得较深和更需要婚姻的一方,由于担心配偶变心,往往更易顺从对方而失去权力(Safilios-Rothschild,1976;徐安琪,2012b:191-210)。一般情况下,女性往往将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婚后在经济和感情上更多地依附丈夫,更有可能放弃权力或接受配偶的支配(拉曼纳、尼雷德门,1995:183)。从这种角度看,"妻管严"的形成是因为丈夫在爱和需要方面更依赖于妻子,因此他们愿意让妻子控制家庭中的权力。

从上述理论来看,"妻管严"的形成存在两种路径。但在不同路径下,"妻管严"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并不一样。婚姻坡度理论认为,在婚姻市场中,女性择偶的对象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自己高的男性,当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反过来时,男性常常会产生自卑心理(李后建,2013)。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不得不接受传统性别分工的颠覆,这可能会加深他们内心的失衡,从而降低婚姻满意度。但是,也有许多"妻管严"的男性,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比妻子低,他们成为"妻管严"可能并不是因为资源依赖而被动让渡权力给妻子,而更可能是一种出于爱与需要的主动行为,那么传统性别分工颠覆带来的失衡感就不会如此强烈。故而,本文认为: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妻子更低的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劣势地位会削弱其婚姻满意度;但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相对更高的男性而言,这种消极影响更小,甚至不会有影响。

三、数据、分析方法与操作化变量

本文将采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6)家庭问卷数据,主要使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multi-group SEM)来检验上述研究假设。CGSS 2006对约30%的受访者继续调查了家庭问卷中的内容。如前所述,由于本文关心的是"妻管严"的婚姻满意度,即需要专门针对男性群体进行分析,筛选样本并列删有缺失信息的观测案例后,得到符合分析条件的样本量为946。

(一)概念操作化与测量模型

首先,婚姻满意度是本文各个研究假设中关注的因变量,即所设定的结构方程模型中的内生变量。笔者使用婚姻生活总体满意度和配偶替代的可能性这两个显变量进行测量,[①]将这二者近似地视为连续尺度。一个合理的预测是,婚姻满意度与配偶替代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丈夫对

① CGSS 2006家庭问卷中H5"总的来说,您对您的婚姻生活感到满意吗?"和H6"若是有机会再次选择您的配偶,您还会选同一个人吗?",笔者根据分析需要进行了重新编码,详见表1。

婚姻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其更换配偶的概率则会越低。

其次,主要的外生解释变量是家庭权力关系模式。与以往多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不对其作简单的类型学上的划分,而是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述,先区分为"妻子从事家务活动"和"自己进行家事决策"两个维度,将这二者视为外生潜变量("家务活动"和"家事决策"),继而分别使用三个(准备晚饭、洗衣服及打扫家里)和四个(子女教养、自己父母奉养、家用支出分配及买高价家庭用品)外生显变量对这两个外生潜变量进行测量。① 在这里,家务活动得分越高,表示妻子从事家务活动的频率越低;家事决策得分越高,表示自己做决策的频率越低。我们认为,夫妻双方中哪一方从事家务活动的频率越低,同时进行家事决策的频率越高,则该方在家庭生活中权力越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相对更占据优势地位。由于本文只考察男性,所以如果被访者在家务活动和家事决策的两组显变量上的得分越高,说明其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相对地位越低,越可能为前文中定义的"妻管严"群体。

基于上述两点,本文先对全样本设定并检验了测量模型(如图1所示)。另外,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观测变量描述统计结果参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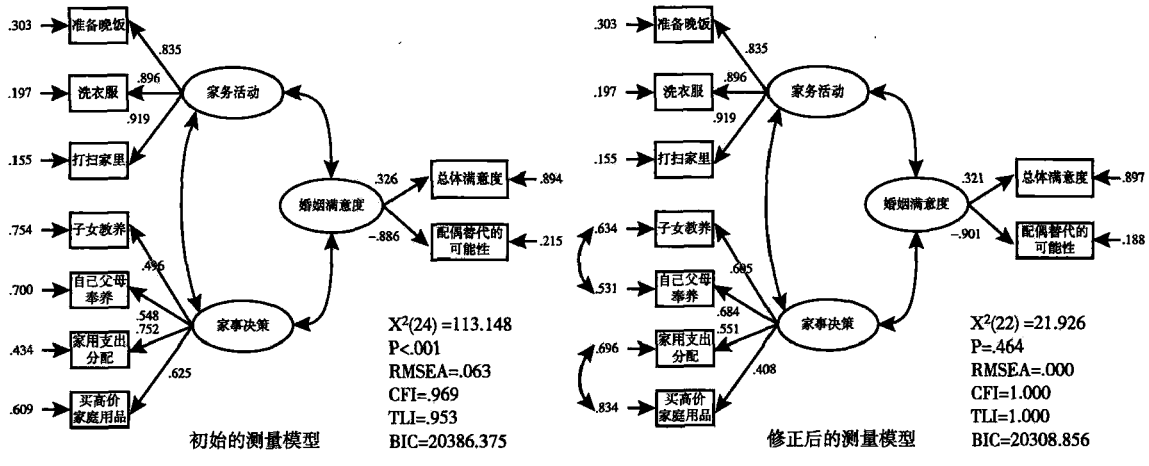

图1 测量模型及模型拟合结果

图1(左)报告了初始测量模型的拟合结果,发现依图1(左)设定的测量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并不是很好:$\chi^2(24) = 113.148$,在0.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这说明由该模型预测的协方差矩阵与样本数据观测到的协方差矩阵有着显著的差异,且RMSEA(近似误差均方根)指标也大于0.05。所以,我们试图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对其进行修正,设定了(子女教养和自己父母奉养)、(家庭支出分配和买高价家庭用品)这两组外生显变量的误差项相关,当然,我们认为这一约束的假定有着相当的合理性。修正后的全样本测量模型$\chi^2(22) = 21.926$,$P = 0.464$,RMSEA接近于0,BIC与初始测量模型相比减小了77,模型拟合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另外,测量模型估计得到的各个负荷系数的方向与前文中给出的理论预测均相一致,且各标准化负荷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0.3,可以认为各显变量对潜变量有着较好的测量效度(王卫东,2010:115-117)。

(二)全模型和分析策略

完成了测量模型的估计,以及对本研究所涉及的三个核心概念的测量效度进行了评估之后,笔者的分析策略是,先针对全样本构建同时包括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的全模型:在测量模型的基础

① CGSS 2006家庭问卷中H2"过去一年,下列家务事,您配偶多长时间会做一次?H2a准备晚饭、H2b洗衣服、H2c打扫家里"和H3"下列家庭事务是由您还是您配偶决定?H3a子女的教养、H3b自己父母的奉养、H3c家庭支出的分配、H3d买高价家庭用品"分别对应测量外生潜变量"家务活动"和"家事决策"。之所以在这两个维度上定义外生潜变量,一方面基于理论上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家庭权力的区分,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设定测量模型的过程中也发现,如果将这两个维度进行合并,该测量模型的拟合较目前模型要差。

上,增加了由妻子从事家务活动和自己进行家事决策这两个外生潜变量分别都指向内生潜变量婚姻满意度的两条路径,目的是检验前文中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考察丈夫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相对位置是否会对其婚姻满意度发生影响。

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相应的多组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假设 2.1 和假设 3。有关样本组的划分方法是:(1)城市男性与农村男性:依居住地划分;(2)学历分组:考虑到初级教育的普及,以高中教育为标准划分为了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和无高中学历者;(3)男性社会经济地位分组:依夫妻年收入差将整个男性样本分为了收入高于妻子组和收入低于妻子组。①

表 1　　研究所使用变量的统计描述和相应操作化说明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操作化说明
内生显变量			
总体满意度	3.942	.665	总体满意度:最小值 =1,代表非常不满意,最大值 =5,代表非常满意;配偶替代的可能性:最小值 =1,代表一定不会更换配偶,最大值 =4,代表一定会更换配偶。利用这两个变量测量内生潜变量“婚姻满意度”
配偶替代的可能性	3.292	.782	
外生显变量			
准备晚饭	1.661	1.286	最小值 =1,代表妻子几乎每天从事家务活动,最大值 =7,代表妻子从未从事过家务活动。利用这三个变量来测量外生潜变量“家务活动”
洗衣服	2.024	1.406	
打扫家里	1.855	1.331	
子女教养	2.980	.826	最小值 =1,代表总是由自己进行家事决策,最大值 =5,代表总是由妻子进行家事决策。利用这四个变量来测量外生潜变量“家事决策”
自己父母奉养	2.899	.735	
家用支出分配	2.993	.850	
买高价家庭用品	2.905	.815	
分组变量			
城乡属性	.582	.493	城市 =1,农村 =0
学历	.375	.484	高中及以上 =1,高中以下 =0
男性社会经济地位	.544	.498	收入比妻子高 =1,收入比妻子低 =0

四、分析结果

(一)“妻管严”的婚姻满意度低吗?

我们首先拟合全样本的结构方程模型,以检验男性家庭权力地位与其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参数估计结果见图 2。各项用于评价拟合优度的指标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拟合得很好(卡方检验不显著,RMSEA =0,CFI =1)。由图 2 可以看到家务分工和家事决策指向内生潜变量婚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0.183 和 -0.129,并且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这说明,家庭权力地位对男性的婚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妻子更少地从事家务活动,以及自己更少地进行家事决策,都会显著地削弱作为丈夫的婚姻满意度。另外,由于图 2 中报告的均是标准化路径系数,此估计结果还能够说明,家务活动对男性婚姻满意度带来的影响要更大。这些结果基本支持假设 1,即在家庭权力关系中占据劣势地位的男性,婚姻满意度会更低。在前文

① 关于收入,考虑到对于多数家庭来说,丈夫的收入一般还是会高于妻子的收入。笔者对 CGSS 2006 中夫妻收入差距状况进行简单描述统计,结果发现,家庭中丈夫的年收入平均高出妻子 3800 元左右。因此我们将比妻子的收入高出 3800 元以上者定义为收入远高于妻子的男性样本组,而将与妻子的收入差在 3800 元以内及丈夫的收入低于妻子的,作为收入与妻子差不多,或低于妻子的男性样本组,正文中为简明起见,统一使用收入高于妻子组和收入低于妻子组。

中,笔者进一步假设这二者的关系在不同的宏观现代化进程和微观社会互动过程中有着差异性的表现。笔者下面试图在各种具体的情境条件下,进一步分析家庭权力关系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各种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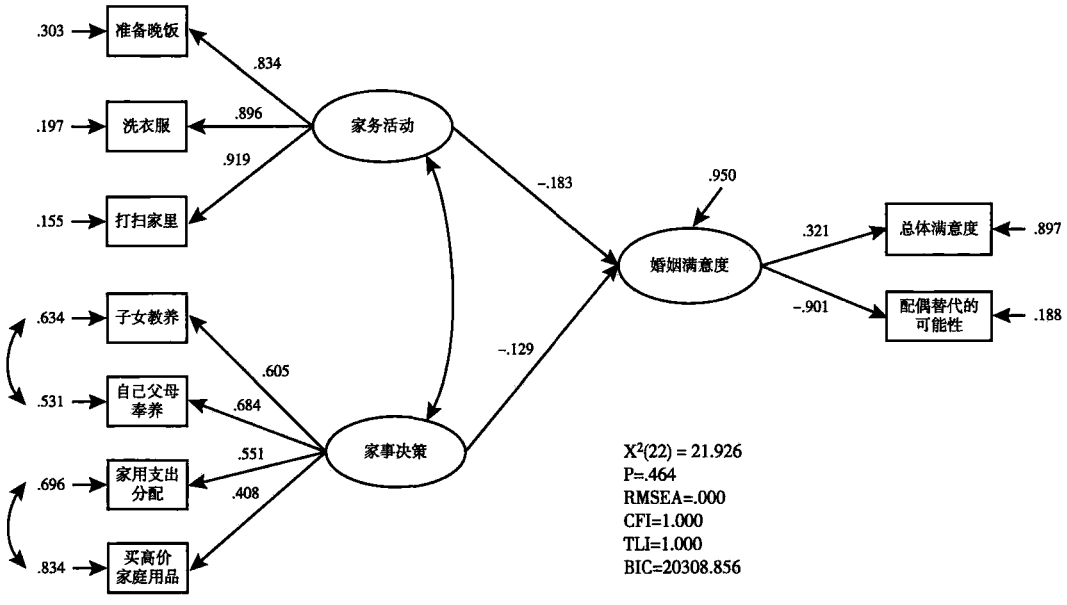

图2 家庭权力关系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全样本SEM估计结果

(二)现代化变迁、家庭权力与婚姻满意度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本文提出的第二组假设进行检验。如前文所述,本研究拟采用多组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传统上,考察交互效应是进行多组比较分析重要方法,我们除了想直观地比较各组之间家庭权力关系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程度上的高低之外,还希望知道各组的这些高低不同的影响在程度上是不是也有着实质性的差异。这里,我们或将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相对应地理解为回归模型中的交互效应分析(Acock,2013:207-209),或按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的术语,称之为跨组不变性检验,即通过对各组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相同与否进行检验,来比较因果关系的组间差异(王卫东,2010:136-137)。

为检验假设2.1,我们首先将整个男性样本根据居住地的城乡属性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之后设定了三个多组全模型进行估计。其中,模型aI是假设家庭权力关系的两个维度(家务分工和家事决策)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均存在城乡差异,模型对农村组和城市组在这两条路径上的效应参数同时进行估计,共得到了四个路径系数,结果参见表2模型aI。该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在家事决策维度上,农村组和城市组的路径系数大小相差不大,因此考虑可以约束两组在该维度上的路径系数相等,以简化模型。故模型aII假设在家务分工的维度上,家庭权力关系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但在家事决策维度上,城乡间并没有实质性差异。最后,我们还设定了模型aIII,它假设家庭权力关系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存在城乡差异。同样,模型aII和模型aIII的模型估计和模型拟合结果也参见表2。

关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价,似然比卡方检验用于查看由模型预测的协方差矩阵与由样本数据观测到的协方差矩阵在多维空间上的距离是否足够接近。若该检验在统计上不显著,则不能够拒绝二者之间无差异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良好;反之,若统计检验显著,说明模型拟合得并不好。因此在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似然比卡方检验不显著,即零假设不被推翻。但是,似然比卡方统计量容易受到样本量的影响,在大样本的情况下,零假设很容易被拒绝。研究者为此发展了多种拟合优度指标,本文选取了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贝叶斯信息指数(BIC)和比较拟合指数(CIF)等几个研究者们经常使用的拟合优度指

标对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其中,对于 RMSEA,大于 0.1 标示模型拟合得不好,低于 0.1 模型可以接受,低于 0.08 表示好的拟合,低于 0.05 表示非常好拟合;对于 CFI,推荐的临界值为 0.9,大于或等于表示可以接受,小于 0.9 则需要考虑重新设定模型;BIC 更常用于模型的比较,BIC 较小的模型比 BIC 较大的模型拟合数据更好(王济川等,2011:19 - 23)。

比较模型 aI - 模型 aIII 可以发现:第一,模型 aII 嵌套在模型 aI 中,且对观测数据的拟合优度在这两个模型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但依模型 aII 的设定可以减少一个参数的估计,相对于模型 aI 来说更符合简约性的要求,故而舍弃模型 aI;第二,模型 aIII 嵌套在 aII 中,两模型似然比卡方值相差 7.34(模型自由度相差 1),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因此并不能接受模型 aII 和 aIII 之间没有差异的原假设,这说明模型 aII 与模型 aIII 相比,在对观测数据的拟合上极有可能存在差异。从其他的拟合优度指标来看,BIC、RMSEA 和 CFI 也都显示模型 aII 拟合得要更好一些。考虑选择符合简约性要求,同时有着一定信息含量且对数据拟合得较好的模型,最后,笔者决定采纳模型 aII。

解读模型 aII,在家务活动维度上,对居住在城市的男性来说,家务活动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几乎不显著;而对于居住在农村的男性来说,家务活动显著降低了婚姻满意度。这一结果表示,农村女性更少地从事家务活动,会很大程度地削弱农村男性的婚姻满意度;而对于城市男性,这一消极影响较小,符合本文假设 2.1 的预期。

以上是从城乡属性角度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假设(假设 2.1)。接下来,我们将从受教育程度区分的角度,继续对现代化进程影响的假设给出检验,所采取的分析策略与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根据假设 2.2,笔者依受教育程度是否达到高中,将整个男性样本划分为高中以下和高中及以上两个样本组,同样是设定了三个多组全模型进行估计。与上面的分析相类似,模型 bI 假设了家庭权力关系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在教育程度不同的男性群体中存在差异;模型 bII 同样是根据模型 bI 的估计结果,将两组家务活动的路径系数设定为相等;模型 bIII 则是将两组的家务活动和家事决策的路径系数都约束为相等,模型估计和拟合的结果详见表 2。

与考察城乡分组一样,通过对模型评价进行比较,选择对观测数据拟合得较好且同时符合简约性原则的模型作为分析之用。和对上述考察城乡分组三个模型的分析程序类似,我们发现模型 bII 更为符合上述要求,故决定最终采纳模型 bII。由此,可以判断在家务活动维度上,家庭权力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不受教育因素影响。而在家事决策维度上,分析结果显示,学历为高中以下的男性,自己在家事决策上处于劣势地位将会削弱其婚姻满意度;但对于学历为高中及以上的男性,家事决策对提高婚姻满意度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这一结果基本支持假设 2.2。

(三)夫妻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会有影响吗?

接下来对假设 3 进行检验。我们同样设定了三个多组结构方程模型,并对它们进行比较。观察各个拟合优度指标,这三个模型对观测数据拟合得都非常之好。但是,对嵌套模型进行似然比检验的结果同样是,模型 cI 和模型 cII 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但是模型 cII 和模型 cIII 之间却表现出显著差异($P < 0.05$),依然同时考虑拟合优度与简约性原则,决定最终采纳所设定的第二个模型(模型 cII)。另外,通过对模型 cIII 的路径系数做跨组不变性检验也能够发现,家事决策的效应在收入高于妻子组和收入低于妻子组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家务活动的交互效应则十分显著,这也与采纳模型 cII 的结果相一致。

家务活动维度上的权力关系对婚姻满意度的影响,解读模型 cII 的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对于收入高于妻子的男性群体来说,家务活动变量对他们的婚姻满意度并没有发挥显著影响;而对于收入低于妻子的男性群体来说,外生潜变量到内生潜变量婚姻满意度的路径系数很大(-0.257),且统计显著。这意味着妻子更少从事家务活动会显著地削弱丈夫的婚姻满意度。也就是说,仅仅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不高于妻子的男性而言,“妻管严”的地位才会使得他们的婚姻满意度下降,故而本文提出的假设 3 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证实。

表2 家庭权力关系对丈夫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多组SEM估计结果

	分组	妻子从事家务活动→婚姻满意度		自己进行家事决策→婚姻满意度		似然比卡方	df	P值	RMSEA	BIC	CFI
		路径系数	标准误	路径系数	标准误						
模型aI	城市	-.081	.047	-.093	.059	62.134	57	.298	.014	20291	.998
	农村	-.339	.077***	-.140	.069*						
模型aII	城市	-.082	.048	-.095	.040*	62.126	58	.331	.012	20286	.999
	农村	-.342	.080***								
模型aIII	全样本	-.169	.050***	-.117	.044**	69.465	59	.165	.019	20287	.996
模型bI	高中及以上	-.163	.085	.019	.079	72.772	57	.078	.024	20357	.995
	高中以下	-.179	.055***	-.168	.067*						
模型bII	高中及以上	-.178	.053***	.019	.079	72.778	58	.092	.023	20350	.995
	高中以下			-.170	.066**						
模型bIII	全样本	-.181	.057**	-.133	.057*	75.861	59	.069	.025	20346	.994
模型cI	收入高	-.098	.060	-.133	.073	66.431	57	.184	.019	20376	.997
	收入低	-.257	.073***	-.124	.067						
模型cII	收入高	-.097	.060	-.125	.051*	67.059	58	.194	.018	20369	.997
	收入低	-.256	.073***								
模型cIII	全样本	-.189	.057***	-.134	.054*	71.944	59	.120	.022	20367	.996

注:(1)表中报告的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回归系数;(2)* P<0.05,** P<0.01,*** P<0.001。

五、小结与讨论

通过对CGSS2006年家庭问卷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在家庭权力关系中的地位确实会影响其婚姻满意度。然而,当把这一影响置于不同情境条件下时,结果则更为复杂。

首先,在现代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基本诉求。我们预测,传统两性角色分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妻管严"的家庭地位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经验结果仅部分支持了这一预测:一方面,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妻管严"现象更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妻管严"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那些受过更多教育,被现代性影响程度更大的男性也能接受"妻管严"的家庭地位,因而不会降低他们的婚姻满意度。

其次,"妻管严"的形成路径也会影响家庭权力与婚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妻子的男性更可能因为"资源依赖"而被动让渡家庭权力给妻子,这也会降低他们的婚姻满意度;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妻子的男性则通常在爱与需要的考虑下主动服从于妻子,而这并不会引起他们自身的失落感,从而也不会导致他们婚姻满意度的明显下降。

从男女平等的角度来看,"妻管严"是一种正常的夫妻关系。但在现实社会中,"妻管严"又常常略带有消极意义,这使得那些被贴上该标签的男性的婚姻满意度降低,进一步则可能会影响到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为了缓和"妻管严"对男性婚姻满意度的消极影响,最为关键的是要进一步推动社会观念的现代化,尤其是男权观念的改变;其次,在"妻管严"的婚姻关系中,妻子更需要与丈夫在感情上进行顺畅沟通,从而缓解丈夫由于"妻管严"而带来的失落与不满。

参考文献:

陈婷婷,2010,《夫妻权利与婚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2006全国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西北人口》第1期。

贾春增,2008,《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拉曼纳、尼雷德门,1995,《婚姻与家庭》,李绍嵘、蔡文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李后建,2013,《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幸福吗? ——基于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人口与发展》第2期。
刘爱玉、佟新,2014,《性别观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卢淑华,1992,《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根据北京,西安等地的调查》,《社会学研究》第4期。
马春华、石金群、李银河等,2011,《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趋势和最新发现》,《社会学研究》第2期。
申顺芬、林明鲜,2013,《婚姻满意度研究:以山东省为例》,《人口研究》第4期。
王济川、王小倩、姜宝法,2011,《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与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天夫,2006,《城市夫妻间的婚内暴力冲突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社会》第1期。
王卫东,2010,《结构方程模型原理与应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安琪,2004,《夫妻权力模式与女性家庭地位满意度研究》,《浙江学刊》第2期。
——,2005,《夫妻权力和妇女家庭地位的评价指标:反思与检讨》,《社会学研究》第4期。
——,2012a,《离婚风险的影响机制———一个综合解释模型探讨》,《社会学研究》第2期。
——,2012b,《亲密伴侣权力及其对性别平等感的影响机制》,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家庭研究中心《中国家庭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徐安琪、刘汶蓉,2003,《家务分配及其公平性》,《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徐安琪、叶文振,1998,《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许放明,2014,《责任自觉与成果共享:“妻管严”现象的一种解读》,《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叶文振、徐安琪,2000,《婚姻质量: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启示》,《人口研究》第4期。
郑丹丹、杨善华,2003,《夫妻关系“定势”与权力策略》,《社会学研究》第4期。
左际平,2002,《从多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夫妻不平等》,《妇女研究论丛》第1期。
Acock, A. C. 2013, *Discover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Using Stata*. Texas: Stata Press.
Bradbury, T. N., F. D. Fincham & S. R. H. Beach 2000, "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 Decade in Review." *Marriage and Family* 62(4).
Fincham, F. D. & S. R. H. Beach 2010, "Marriage in the New Millennium: A Decade in Review." *Marriage and Family* 72(3).
Katz, R. & Y. Peres 1985, "Is Resource Theory Equally Applicable to Wives and Husbands?"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6(1).
Kolb, T. M. & M. A. Straus 1974, "Marital Power and Marital Happiness in Relation to Problem-solving Ability." *Marriage and Family* 36(4).
McDonald, G. W. 1980, "Family Power: The Assessment of a Decade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970 - 1979."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4).
Michel, Andree 1967, "Comparative Data Concerning the Interaction in French and American Families."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9(2).
Mirowsky, J. 1985, "Depression and Marital Power: An Equity Mode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Safilios-Rothschild, Constantina 1967, "A Comparison of Power Structur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in Urban Greek and French Families." *Marriage and Family* 29(2).
——1970, "The Study of Family Power Structure: A Review 1960 - 1969."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2(4).
——1976, "A Macro-and Micro-examination of Family Power and Love: An Exchange Model."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37(3).
Szinovacz, M. E. 1978, "Another Look at Normative Resource Theory: Contributions from Austrian Data. A Research Note." *Marriage and Family* 40(2).
Waite, L. J., Y. Luo & A. C. Lewin 2009, "Marital Happiness and Marital Stability: Consequences fo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1).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朱　斌)
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乔天宇)
责任编辑:石金群

greatly compared to the past. Adolescence is the main stage to accept education. Through study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ttainment and its changing tendency deeply and carefully, we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life development of young men and women with different family background.
Keywords: Education Attainment Gender Inequality Number of Siblings Family Background Rural and Urban Difference

Analysis on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 *Ji Wenxiao*(69)

Abstract: By selecting method of narrative analysi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type, strategy, and characteristic of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regarding resilience in families with children suffering from rare diseases, there mainly exist the following five categories: type of development and sublimation, type of internal equilibrium, type of turbulence, type of struggle, and type of abandonment; these five categories could be further generalized into 'elite-driven type' and 'resource/system-restricted type'; regarding functioning of family resilience,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come from elites within family and adjustment in family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mode of behavior, etc.; the main obstacles come from restriction of resource and system as well as individual personality trait, family structure, and relationship elements. Currently, family resilience has display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 initiative and obvious strategic action under structure's restriction.
Keywords: Rare Diseases Family Type Resilience

The Study on Marriage Squeeze among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1989 to 2030 ..... *Sun Weihong & Tan Yuanfa*(78)

Abstract: Due to larger gap between male population and female population available in marriage market and imbalance in sex ratio, the marriage squeeze is hence formed , it could reflect potential pressure in mate-selection in a cohort popul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ixth national census, this paper adopts method of queue element and method of sex ratio in selection of marriage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in first marriage market and its changing tren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from 1989 to 2010, the marriage squeeze in China increased and decreased abruptly, and embodied in different degree of mild marriage squeeze among males and females; from 2011 to 2030, th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is increasing gradually year after year, the value of MR will reach 119.86 by the year of 2030, it belongs to moderate degree of marriage squeeze among males, and will lead to a few men's unmarried situation in their whole life in this period. Of course, due to gradual enlargement of gap in couple's marriage age and intermarriage circle , plus implementation of two children policy towards couples either one of whom is 'single only child', the potential pressure of mate-selection in future market of marriage will be alleviated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Queue Element Method First Marriage Market Sex Ratio in Selection of Marriage Marriage Squeeze

Are Hen-pecked Husbands Happy in Their Marriage? ..... *Zhu Bin & Qiao Tianyu*(85)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text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men's relative status i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on their marriage satisfac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relative inferior status i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hen-pecked) may decrease men's marriage satisfaction. However, this kind of negative influence will change with concrete situation: on the one hand, for men living in areas more affected by modernization, this kind of negative influence is not significant; on the other hand, for men with higher social economical status, they might transfer partial family power to their wives due to consideration of love and need, hence this will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their marriage satisfaction .
Keywords: Marriage Satisfaction Family Power Structure Modernization Resource Dependence